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孟宪承教育论著选

周谷平 赵卫平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G40-592-1/11



孟宪承 (1894-1967)



1949年5月，孟宪承（前排左四）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同学合影



1949年春，孟宪承与浙江大学教育系师生在玉皇山郊游



1952年10月，孟宪承在庆祝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一周年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



1957年冬，孟宪承与张瑞璠及华东师大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员合影

本书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总主编：叶立群 吴履平

●副总主编：吕 达 田正平 邱 瑾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总 序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是《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的继续，选辑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重要教育论著。这套丛书业已列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目的在于：力图系统完整地搜集、整理、保存我国近代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文献，以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教育思潮，以及不同流派的教育观点。

这套丛书注重选辑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论著，以反映当时的教育学术水平、教育思潮的趋势，以及教育流派的论争。选辑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实验或调查报告，以及专著节录等。除尽量搜集已经公开发表的教育论著外，并大力访求未公开发表的遗文和手稿。有的教育家，虽已出版过选集或文集，亦重新选辑纳入丛书，以体现新的特色。

这套丛书按教育家立卷。各卷实行主编负责制。一般情况，一册即为一卷，但篇幅多者可以一卷分为几册；篇幅少者可以几卷合为一册。各卷由主编或特约专家撰写一篇前言，简要评述该教育家的教育事迹、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和影响。各卷卷首载有该卷作者的照片、手迹等，卷末附录该卷作者教育论文、专

著、译文、译著的年表或目录。对于有些作者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也可酌收几篇，列为附录。读者一卷在手，便可纵览全貌。

这套丛书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倡议的，他对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多次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并一直鼎力支持。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主编和编者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原丛书总主编陈学恂教授为这套丛书总体计划的拟订和前期编审工作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我们对此深表敬意。由于陈学恂先生逝世，高航同志工作变动，本丛书编审委员会作了相应调整，由下列人员组成（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立群、田正平、吕达、吴履平、邱瑾、邵祖德，以叶立群（中国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学会理事长）、吴履平（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总编辑）为总主编，吕达（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田正平（杭州大学教授）、邱瑾（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为副总主编。

限于水平，这套丛书的编、审工作还存在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编审委员会

1994年1月

本卷前言

孟宪承（1894—1967），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际工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孟宪承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年幼丧父，家境清寒。1900年6岁时进入常州府小学堂读书，1908年小学堂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直接升入中院学习。1912年7月，他从南洋公学中院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进入南洋公学大学本科深造。他考入了当时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并于1916年以一流的成绩毕业，得到该校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的赏识和器重。同年9月，到北京清华学校当教员。1918年9月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8月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刻苦钻研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教育史等学科，对各种不同的教育思潮和流派，着眼于比较分析，既不盲目附和，也不妄加非议，注重通过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和鉴别。他的留学生涯，对其一生的教育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1921年11月，仍因家庭的重负，离开了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就业，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9月，应母校圣约翰大学

校长卜舫济的邀请，担任该校国文部主任、教授。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年31岁的孟宪承教授目睹无辜的学生倒在血泊之中，满怀一腔爱国热情和悲愤，不顾自己是在帝国主义创办的教会大学工作，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也不顾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以民族大义为重，挺身而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在与卜舫济的争执、斗争中，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毅然声明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率领爱国学生走出圣约翰大学，与许多爱国志士一起，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办起了光华大学。同年9月，应清华大学邀请任该校教授。不久辞职南下，于1927年9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当教授。1929年9月又被聘为浙江大学教授。1933年在杭州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任校长，从事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后，他又先后辗转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曾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1946年浙江大学在杭州复校，孟宪承任该校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州解放，孟宪承等九人被任命为接管浙江大学小组成员，紧接着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学校工作。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努力、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在浙江大学发起成立“新教育研究会”，研究社会主义教育科学。1951年，他被调到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并担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定为一级教授。

孟宪承在文、史、哲等多门学科均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晚年刻苦学习俄语。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就接触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唯物史观。解放后更是努力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活动。尽管他的教学业务、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极为繁忙，但他总是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受到师生的爱戴。建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他悉心培养，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的通晓，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掌握，外国语的熟练运用等。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感染熏陶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人才。不幸的是，“文革”中他遭受“四人帮”的迫害、折磨，终于1967年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孟宪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是对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孟宪承的一生主要在大学工作，多年的经历使他形成了自己有关大学教育的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大学是最高学府，这不仅因为在教育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因为在人类运用其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大学的理想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智慧的创获”。大学不仅有保存和传递人类知识遗产的功能，而且更要努力于知识的增加，奋力于创造发明，提倡研究的精神；二是“品性的陶熔”。大学师生从来被认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分子，反映着社会最美的道德理想，因此，师生应该在大学的群体生活中，注重品性的锻炼；三是“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晚近民族的竞争，社会机构的突变，把大学直接放在民族和社会需要的支配之下，世界各国都强调大

学作为民族之魂的重要地位。由此，大学的具体任务是研究、教学和推广。大学既以智慧的创获为最高理想，当然就以研究为其最高任务。但学者殚精尽力，锐意发明，既穷毕生之力于其所学，也要能够得人而传其所学，“学术的传习和研究不能截然分离”。教学是学校的天职，大学也非例外。此外，大学还应推广其知识于它的“官墙”之外，即所谓的“大学到民间去”。

在《高等教育的新试验》一文中，他提出了改革大学教育的主张。比如，课程方面，大学里各学科多半因袭着习惯的标准，分“科”分“系”。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知识的总量愈增，分科也愈密，学生要有专精的学问，非分途致力，从事专攻不可，但同时人生是整个的，文化是整个的，若学生对于文化没有一种概括的了解，分科太早，所习太窄，便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结果只得些片段、机械的知识、技能，而失却它们在人生上的意义，就是对于应用而言，也必感受困难。又如，大学里的教学方法，除实验科学以外，偏重讲演，缺乏学生的自动研究和教师的个别指导。对此，他提出大学课程，至少是前期的课程，应注重综合的组织，教学方法应注重学习的指导。这些见解早在70年前提出，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孟宪承注重师范教育，强调培养师资、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学校的根本。他说：“现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把教育看作国家的命脉，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为改进中等教育计，没有一个不在高等教育里，供给师范的训练。”（《教育学科在大学课程上的地位》）教育是引导儿童发展、传衍社会文化的事业，系着民族的前途。因此，作为一个教师要热爱儿童，并以自己的教学服务于社会。教师不但需要掌握所教学科的学识、技能，还要接受专门的训练，即要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等教育科学知识。

民众教育是孟宪承着力最著的领域之一，在他的论著中有相当篇幅是论述这一问题的。他认为，民众教育的实质就是使民众能适应其继续不断的生活。因此，首先要具体地分析和研究民众的全部生活情形，要亲自到民间去，与他们生活一处，然后才能制定实施教育之目标。就中国民众的实际状况而言，实施民众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其中心任务应是提高生计，满足娱乐，这是民众切身的需要。提高生计，就是用职业教育推广科学技术，在乡村注重农业补习，在县市注重工商业补习；而满足娱乐，则要寓教育于种种娱乐之中，培养公民精神。他还就民众教育的组织机构、实施办法、教材、师资、经费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还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民众教育的这两个目标，并不是教育的力量可以完全解决，实在算是政治上的问题。孟宪承不仅在理论上积极探索中国式的民众教育之路，而且身体力行，投身于实际的民众教育运动。他在杭州创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亲任校长。在江苏的北夏进行系统的民众教育实验。在实践中，他深深地体会到，“真实的教育，必须在农人的实际生活里进行。只有把握住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帮助他们逐渐满足生活的需要，由做而学，由行而知，才能够显现教育的功效。”（《北夏实验区的最近》）

留学英美，学贯中西的功底，使孟宪承对中外教育的了解、比较和鉴别有着独到的见地。他主张有借鉴地吸取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反对不顾国情，亦步亦趋。他曾翻译、撰写了大量介绍外国教育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的著作、论文，内容包括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教育著作、各国教育发展概况、各种新教育实验、教育方法及成人教育和民众教育等。他指出，当时国内教育界对世界新教育思潮的探究和学习，其坏的方面，即盲目的模仿，无理性的机械、稗贩的介绍，广告似的标榜要坚

决去除；但好的方面，即虚心的态度和对教育之科学的研究，不仅要保存，还要继续扩大。并且强调：“每个现代国家的教育制度，有它所依存的经济、政治，以至一般文化的条件。这在那些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是无法囫圇地移用的。”（《为汪懋祖〈中学制度之检讨与改进〉作的前序》）总之，对于国外的新制度和新方法，要忠实地研究，慎重地试验，恪守其“限界”而善用其“功能”，决不能盲目搬用或因噎废食。

孟宪承在中外教育史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曾编著有《新中华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等著作，十分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注重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对为什么要研究教育史，他的看法是：教育上一切制度的繁兴与衰颓，一切学说的成立与毁灭，在横的方面，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规范，在纵的方面，为先前的时代伏流所影响。现代教育全从过去事实中演化蜕变而来，我们要明了教育演进的轨迹，要更透彻地认识现代教育，更要以前人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天实施教育的参考，都必须研究教育史。他把这一思想贯穿于教育史研究之中，他的论著不仅占有翔实的资料，更具有科学的识见，多年来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和大学教育系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孟宪承对初中国文教学也有不少的研究。他指出，教师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启发学生的思想，是当时国文教学的二大弊病。“向来国文课，只有教师的活动，没有学生的活动；只有教师的教授，没有学生的学习，这实是国文教学失败的总原因。”（《初中国文之教学》）由此，他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此外，在教育哲学、教育实验、德育、美育等诸多领域，也有很多的研究。

孟宪承主要教育论著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新中

华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主要译著有：《思维与教学》（杜威）、《教育方法原论》（克伯屈）、《教育哲学大意》和《现代教育学说》（波特）等；曾编写《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教材。

孟宪承一生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教育论著以前尚未系统收集整理过，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本论著选能对研究孟宪承的教育思想有所裨益，并为中国教育史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者

1995年12月

编者的话

一、本书收录孟宪承重要教育论著 52 篇，起自 1922 年，迄于 1948 年。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书评、译序，以及部分著作的节录，大致反映了孟宪承的主要教育观点及其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另编《孟宪承主要教育论著目录》附于书后，以便读者进一步查阅和研究。

二、收入本书的论著，按发表或出版年月排列。编者力求保持原作面貌，对标题的变动，均在题注中说明。原著者注释置于页脚；本书编者注释置于篇末。

三、原论著的繁体字及直行编排，均改为简体字和横行排印。对于原著中明显的错字，将订正之字置于错字后的〔 〕内，增补脱字，置于〈 〉内，原文缺字处，用□表示。凡原著中因直排版而出现的“如左”、“如右”等字样，均改为“如下”、“如上”等。

四、译名均用著者原译名，未作改动。

本书选编过程中，曾得到杭州大学教育系董远骞教授、中国教育史博士生谢长法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张瑞璠教授、孙培青教授、河海大学陈里红博士等人的热心帮助，并得到孟宪承先生的亲属孟永伟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此书的完成，得以了却恩师陈学恂先生生前的心

愿，在此，对他多年的教诲，表示深切的怀念！由于我们学力所限，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5年9月